



8-15

# 美國漢學家倪豪士教授的《史記》英譯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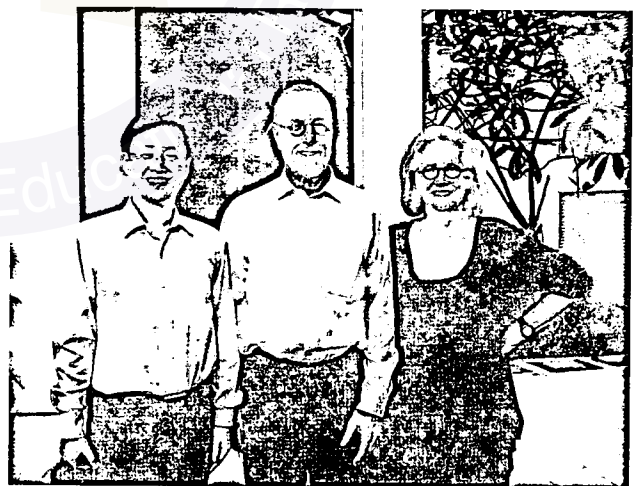
William H. Nienhauser'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Shiji*

曲景毅 (Qu Jingyi) \*\*

倪豪士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1943-), 美國著名漢學家, 現任威斯康新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東亞語言文學系霍爾斯特·斯科姆 (Halls-Bascom) 講座教授。早年遊學於遠東和德國, 1972 年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榮獲多項榮譽, 屢任威斯康新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 (1980-2, 1987-90, 2004, 2011-12), 德國、日本、臺灣、新加坡及中國大陸多所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研究員, 2003 年由於其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突出貢獻, 獲得 Humboldt Foundation 終身成就獎。他的主要論著有《皮日休》(1979)、《傳記與小說: 唐代文學比較論集》(中文論文集, *Biography and Fiction: A Collection of Comparative Articles o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2007)、《柳宗元》(合著, 1973) 及近百篇論文與書評。在學術研究之外, 他長於編輯與翻譯, 主編《印第安那中國古典文學指南》(*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1986, Vol. 2, 1998), 編著《唐代文學研究西文論著目錄》(1988)、《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1994)。他是美國唯一一份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雜誌《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i.e. CLEAR*) 的創辦者, 並長期擔任主編 (1979-)。他是當之無愧的古典文學翻譯家, 致力於翻譯《史記》(*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至今已出版 6 卷)、唐傳奇 (新近出版 *Tang Dynasty Tales: A Guided Reader*, 2010)、杜詩、《搜神記》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成果豐碩, 影響彌深。《文學遺

產》2002 年第 1 期徐公持先生曾以〈一生一世的賞心樂事〉為題對其中國文學研究歷程進行獨家專訪。

筆者曾於 2008 至 2009 年受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至威斯康新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在倪豪士教授的指導下擔任訪問學者一年, 期間應邀參加「第五屆史記翻譯研討會」及倪教授每週組織的《史記》討論組, 對《史記》翻譯者的初稿進行逐篇的對照閱讀, 糾錯補漏, 對疑難問題進行討論。2012 年 1-6 月倪教授受邀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訪問教授, 每兩周組織討論《史記》英譯及相關問題, 筆者亦參與其中。2012 年 10 月 12-14 日, 筆者應邀參加美國威斯康新大學「第六屆



倪豪士夫婦 2011.2.14-19 訪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院, 與筆者合影留念。

\* 作者謹對匿名專家的建議深致謝忱。

\*\* 作者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早期中國歷史工作坊」，討論《史記》卷 117、118、120 的英譯問題。有幸師從倪豪士先生，並親身參與倪教授及其團隊的《史記》翻譯與研究，故撰此文以資紀念。

## 一、倪豪士教授英譯《史記》的特質

據筆者調查，迄今為止，《史記》已經或正在被翻譯成 10 餘種外國語言，包括：法語、英語、俄語、日語、韓語、德語、丹麥語、捷克語、匈牙利語、蒙古語等。這其中既有一般性的普及讀物，也有嚴謹的學術翻譯及注釋著作，對《史記》在世界華語界的普及、推廣及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對《史記》這部巨著的翻譯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完成，許多專項翻譯曠日持久，孜孜以求，並仍在繼續。

在眾多翻譯本中，尤以《史記》的英譯本最多。里昂·羅斯尼 (Leon de Rosny)、赫伯特·艾倫 (H. J. Allen)、夏德 (Friederich Hirth)、德弗郎西斯 (John De Francis)、魯道夫 (Richard C. Rudolph)、杜為廉 (William Dolby) 和約翰·司考特 (John Scott)、雷蒙·道森 (Raymond Dawson) 等均嘗試翻譯《史記》的部分篇章。<sup>1</sup> 此外，羅切斯特大學魏漢明教授有《史記》選譯本，華裔學者楊憲益與他的妻子戴乃迭 (Gladys)，1974 年編輯兩冊，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英譯《史記》最有影響的有兩種。其一是華茲生 (Burton Watson)，從 1951 年的碩士論文翻譯《史記》卷 124，1961 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華茲生譯《史記》(西漢部分)，狄百瑞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在為此書撰寫序言時稱此書是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最重要的歷史學文獻。<sup>2</sup> 1969 年有增訂本 (增加漢以前的列傳)，1993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華氏新譯《史記·秦朝部分》，合計譯

成《史記》130 卷中的 80 卷，其翻譯可讀性強，但對注釋及相關研究成果關注較少。其二即倪豪士教授主持的英譯《史記》。

上世紀 80 年代末，倪豪士教授等在臺灣文建會的資助下開始翻譯《史記》。後來又得到美國威斯康新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委員會、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等機構的資助。作為主編和主要翻譯者，從 1994 年迄今，倪豪士教授帶領他的團隊，已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史記》6 卷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1, 2, 5.1, 7, 8, 9)，依次為漢以前的本紀、漢代的本紀、漢以前的世家中、漢以前的列傳、漢代的列傳 1、漢代的列傳 2，學術化的翻譯《史記》近二十年，這一浩大的工程仍在繼續。預計全部英譯本將達到 11 或 12 卷，目前還有漢以前的世家下 (Vol. 5.2)、漢代世家 (Vol. 6)、漢代的列傳 3 (Vol. 10) 正在進行當中。《史記》中的表、書未列入翻譯計畫，倪教授曾坦言這些需要視將來的能力及精力而決定是否翻譯。<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倪譯《史記》中的人名、書名、地名、官名等仍如西方其他譯著一樣，採用威妥瑪 (Wade Giles)<sup>4</sup> 的拼音，所以在閱讀時需要熟悉這套拼音方式。

倪譯《史記》的注解具有史學研究的嚴謹性，它是注釋詳盡的學術性著作，沒有太多的功利性，扎扎實實，一卷一卷，二十餘載如一日的潛心研討，採用直譯的方式 (literal translation) 逐字逐句逐篇逐卷的翻譯，力求做到忠實於原文。倪譯《史記》保留了《史記》原文本紀、世家、列傳等的排列順序，在譯文下附有詳盡的歧義考證、地點考證、相關章節成書說明、互文考證說明、文化背景知識注釋及資料依據和辭彙對照表等，在每章譯文後附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的相關評

1 最早期的《史記》英譯可參見 T. Pokora-Timoteus Pokora, "The Present State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Shih chi*. To the Memory of Fritz Jäger." *Oriens Extremus* (1962/2): 154-173。

2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3 按：華茲生已譯有〈六國年表〉、〈漢興以來諸侯王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及〈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或可資部分不足。

4 威妥瑪拼音是英國劍橋大學漢語教授威妥瑪 (1818-1895) 在華任職期間，為方便外國人 (主要是使用英語的人) 學習和掌握漢語，根據北京讀書音制訂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給漢字注音。

注和說明 (Translator's Note, 這是一種拓展研究, 富於創新性與啟發性)、該卷已有的西文和日文譯本書目、關於該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 每卷譯文的後面附有全書的參考文獻目錄, 包括中外文的《史記》版本研究、參考文獻、譯本、歷代注疏、關於《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史記》及《漢書》的比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研究著作等。倪譯《史記》的目標是:「盡可能地忠實於原著, 並提供詳盡的注解。注解主要涉及文字的訓詁與考訂, 地名與書名的解釋, 對古代官制、禮儀、習俗等的說明及對一些歷史人物的介紹。」<sup>5</sup>

“This is not an easy read”, 這是倪教授曾經教導我們嘗試翻譯中國古典文獻為英文時需要謹記心中的座右銘。的確, 在逐字逐句翻譯《史記》的過程中, 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 若想準確地譯出每一個字絕非易事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淺近注釋或白話翻譯者囫圇吞棗, 模糊帶過某一個可能正是理解上的難字), 有些時候我們瞭解句字或者段落的大意, 但卻無法準確地理解每一個字句。可是嚴謹的西文翻譯著作卻不同, 可能你會不屑於將「翻譯」作為一種學術來看待, 但翻譯的過程不但是尋求真知的過程, 也是啟發你研究課題的良好途徑, 這是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高品質的翻譯也作為學術著作的原因。舉個簡單的例子, 在新近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史記》這一部分的撰寫者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柯瑪丁 (Martin Kern) 教授, 他的翻譯近乎硬譯, 比如將「列傳」翻譯為 “Arrayed Tradition”,<sup>6</sup> 筆者認為此處之「傳」可能用倪氏翻譯的 “M memoir” 可能更為恰當, 因為柯教授的翻譯並沒有準確傳遞「傳」的意思, 沒有任何註明, 即付諸於具有教材性的著作, 這對於初涉中國文學史的讀者未必允當。

倪譯《史記》參考了大量的相關史籍及中國歷代評點、西方研究成果, 對照《漢書》的相應記載, 往往會有收穫。倪譯《史記》以協同方式翻譯, 一人或兩人翻

譯一卷, 一人翻譯一卷可以保持翻譯的統一與流暢, 兩人協同翻譯又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一人先有初稿, 另一人加工潤飾; 另外一種是兩人各翻譯一半, 然後統一語言與注釋。翻譯組成員有美國、德國、中國的學者, 如果是母語非英語的學者進行翻譯, 通常會有一個英語水準較好的學者相互協作, 以確保成書的英語水準。

這部翻譯的特點是非常高的學術價值和非常準確的翻譯, 但有人認為倪教授的翻譯在文學方面不如華茲生, 甚至倪氏的翻譯剛剛出版時, 有些學者認為該書有的地方因為過於忠實文本所以譯文其實很難理解。<sup>7</sup> 另外, 倪氏翻譯本對出土文獻的重視相對不夠。雖然如此, 總體而言, 倪氏譯本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是西方的學術標準。

以下僅就筆者參預倪氏《史記》翻譯小組的過程中, 曾經遇到的一些翻譯問題, 說明倪譯《史記》對於每一個細節的注重, 也可看出整個翻譯過程中每位翻譯者傾注的心血。

先舉詞語翻譯的例子。比如「持重」的翻譯。《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云:「魏其者, 沾沾自喜耳, 多易。難以為相, 持重。」查《漢語大詞典》「持重」有四重意思, 分別是主持喪祭或宗廟社稷祭祀之事; 擔負重大任務; 舉重物; 穩重; 謹慎。其中後三重意思在《史記》中都有所出現, 第二重和第四重意義之間有重疊或近義。一般讀者在讀《史記》時, 可能只是模糊地大體知道文義, 但當要進行逐字翻譯時, 必須根據具體語境來理解翻譯, 倪教授負責這一卷的翻譯, 他翻譯成 “consider him for the especially heavy burdens of the chancellor”, 我當初建議將「持重」翻譯成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亦可。而「持重」在《史記》的另外一篇〈韓長孺列傳〉亦出現, 意義卻不同, 「張羽力戰, 安國持重, 以故吳不能過梁」之「持重」是「穩重; 謹慎」之意, 翻譯作 “with prudence”。又如計量單位的問

5 〈一生一世的賞心樂事〉,《文學遺產》2002.1: 127。關於這點亦可參見倪譯《史記》第一冊的序言: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 Cheng Tsai-fa,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I [M](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Kang-I Sun Chang &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1(2010.5), p. 100。類似的還有將《左傳》翻譯為 *Zuo Tradition*。似乎這已應用於西方學界, 緣何若此, 未及深究。

7 Grant Hardy, “Reviews: His Honor the Grand Scribe Says...,” *CLEAR* (1996), pp. 145-151.

題。我們會碰到「斬首」一詞的翻譯問題。國家規模的戰爭開始後，敵軍首級經常成為軍功的計量手段。有一些大的戰役殺人殺得太多，提首級過於繁重，便只割取所殺敵人的左耳來報功。那麼，此時「斬首」如何翻譯呢？“head” or “ear”？如果翻譯成“head”的話，應該加注釋予以說明。與此相聯繫的是「率」與「當」的關係。當斬首數符合標準時，稱為「中率」。如《史記·李將軍列傳》：「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當斬首數超過標準時，稱為「過當」，如《史記·匈奴列傳》：「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當」即「率」，需要注意，無「過率」之說。再如副詞「俱」與「具」的異同。「具」與「俱」均有「都」(whole)之意，但並非絕對的同義詞，「俱」是兩個以上的人做同一件事，而「具」是一個人做所有的事。例如《史記·項羽本紀》：「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翻譯時，應該恰當的譯出此句「具」與「俱」的不同。

討論《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一段的翻譯時，小組成員之間就曾經有一場非常愉快的文字交流，你來我往，最終使得恰切的翻譯水到渠成。首先，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我建議將「無行」翻譯為“behaved villainously”，但倪教授則認為，此處應翻譯為“being poor, he was (naturally) without proper behavior”或者“did not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proper behavior”，這樣更準確。「亭長妻患之」之「患之」如何翻譯？這涉及到如何理解文意的問題，我曾經建議將「患」翻譯為“loathed”，但倪教授認為此處「患」意謂“troubled by”，幾個月的時間過去後亭長的妻子“troubled by having to feed Han Xin”，最終翻譯組維持了原來的譯文“fed up with”。在翻譯「信亦知其意」中的「亦」時，涉及到翻譯時的文化語境問題。「亦」翻譯為“indeed”還是“also”？記得我當時初看到“indeed”這個翻譯時頗為表示疑問，只是根據這個單詞的中文意思進行判斷，並建議改為“also”，但倪教授提醒我們，“also”

在英語中需要前面出現類似情況時才可以使用，英語中的副詞有時可以表示許多種意蘊，這是不瞭解英文語言習慣的中國學者容易忽略的。同樣的道理，如何翻譯此段後面的「王孫」？我曾建議翻成“young man”，但倪教授告訴我，當一個年長者對年輕人用英語說“young man”時，通常帶有否定意思，所以建議改為“young master”、“young gentleman”，或者就用“Sir”比較自然些，這都是英語習慣上的微妙之處。

如今，倪教授已經總結出一個翻譯《史記》的詞匯表(glossary)，對於許多不太容易的詞語均有前後一致的準確翻譯，現略舉幾例：副詞如「既而」譯作“after some time”，「之屬」譯作“and the like”，「遂」根據不同的含義譯作“finally, consequently, then; to be successful, complete”，「乃」根據不同的含義譯作“then, thus, yet, just, so it's, none other than,”(經常將整個句子倒裝譯作only then did)；名詞如「屬籍」譯作“clan register”，「曾庶孫」譯作“great grandchildren of a member of the nobility”，「足下」譯作“Honorable Sir”(polite title)，「萬民」譯作“myriad people”；動詞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與戰」譯作“to give battle to”，「奉詔」譯作“to receive and edict”，「聽政」譯作“to preside over the government”(「為政」譯作“to administrate the government”)，「爭長」譯作“to contend for priority”(「爭強」譯作“to contend for power”)，「稱制」譯作“to cause to be called decrees”，「及難」譯作“encounter calamity or disaster”，「逮治」譯作“arrest and punish”，「登用」譯作“to bring (a worthy man) into the government employ”，「坐法」譯作“to try before the law”等等，讀者可以從中體會這種細膩的翻譯意識，或許你會有不同的翻譯方法，但倪氏翻譯真是力求翻出《史記》的每個字詞，在這些哪怕是非常細微的差別中，凝結了倪教授及其團隊的多少心血可以想見。

在翻譯「諸母漂」一段時，倪豪士教授對我和另外一位訪問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何李博士的意見，曾有一段精彩的分析：

For 漂 I'm going to start in the *Hanyu da cidian* (6:75b), although I agree with Li that dictionaries are only collections of modern

scholars' understandings of texts and that we need to look back at the texts themselves. I think Jingyi agrees with this, too. But modern dictionaries are good places to start to find these sources. Anyway, on 6.75 the *Hanyu da cidian* glosses piao3 as *chong xi* 沖洗 “to wash or rinse” (citing Han Xin's *Shiji* biography); *piao nü* 漂女 as 浣衣女 and *piao mu* 漂母 as 漂洗衣服的老婦 (again citing Han Xin's *Shiji* biography). Jingyi points out that the “Chi-chieh” 集解 citing Wei Chao 韋昭 reads 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He suggests the word “batting.” This is a new English word to me. *Webster's 7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p.73) glosses it “layers or sheets of raw cotton or wool used for lining quilts.” The “Chi-chieh” completely changes the idea of this having anything to do with washing or water, doesn't it? Or is the hitting (擊) being done on rocks in the river (remember, Han Xin has gone down to the river bank). If *xu* means some kind of “cotton” (i.e., batting), I would not think it could be washed. Back to *Hanyu da cidian* for the compound *ji xu* 擊絮。There (6: 902b) the gloss reads *chui ji mian xu* 捶擊棉絮 “to beat silk (or cotton—I found glosses for BOTH) wadding with a stick” (‘wadding’ is loose fibers of cloth used for stuffing). OK, now I admit to have waded out in the river too far. I am over my head (meaning “too far into an unknown area”). What is happening here? Is the woman washing clothes or beating silk/cotton wadding? If the latter, wouldn't she be doing it to put in winter clothes? That's what I thought. Then I looked more carefully at the example given in *Hanyu da cidian* under *ji xu* 擊絮 (6: 902b). Wow! It

is from the *Yuejue shu* 越絕書 (Documents on Yue's Extinction or Book on the End of Yue??) and it describes another anecdote about Wu Zixu which (to the best of my memory and my quick check) Sima Qian does NOT include in Wu Zi Xu's biography (like the crawling anecdote we talked about last class). The text reads: 子胥遂行。至漂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托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The same entry later gives a similar story but uses 擊綿。Isn't that “silk floss”? Perhaps this is washing out silk-wadding that will be put in winter clothes? I like that, better than just “washing clothes” because the woman 竟漂數十日。If she were just washing clothes, then she would have come once or twice a week or even (if she had a big family) every day. But not just 數十日。This must be some task that took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like washing out padding for clothes, be it silk or cotton. Please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I looked in some books about “preparing silk” and couldn't find much. What I found useful from your comments in addition to reexamining what the woman was doing (thank you!) is this additional tie to Wu Zi Xu. I think this shows the scene was formulaic—a way to show how a macho man or real man secures loyalty of those he meets and who recognize his talents.<sup>8</sup>

倪教授頗為注重《漢語大詞典》、*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等基本的中英文工具書，力求尋找到「絮」的合理翻譯。而且，通過這段翻譯，倪教授聯想到《越

8 按：此為 2008 年 9 月 20 日倪豪士教授給翻譯小組的郵件。

絕書》伍子胥中的一段類似情節，從而幫助其推進對《史記·伍子胥傳》的研究。這是翻譯促進學術研究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翻譯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細讀（close reading）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會遇到許多細微的問題，深入下去，聯想開來，往往就會找到很好的學術課題，倪教授曾開心地告訴筆者，他的大部分關於《史記》的研究論文都是在翻譯《史記》的過程觸發靈感的。

## 二、倪豪士教授的《史記》研究

倪豪士教授從 1989 年開始專門研究《史記》，迄今為止，共發表關於《史記》的研究論文 20 餘篇，其中包括對《史記》與司馬遷的專題研究、<sup>9</sup>《史記》與其他

史書的比較研究、<sup>10</sup>《史記》在西方的流傳情況、西方學者對《史記》研究、中國《史記》的研究狀況<sup>11</sup>及《史記》的翻譯情況等。<sup>12</sup>此外，倪豪士教授在“Historians of China”（中國史學家）<sup>13</sup>及“Early Biography”（早期傳記文學）<sup>14</sup>中，均有對《史記》的專門討論。在牛津大學版的《世界古代史學史》中，倪豪士教授負責「司馬遷和他的《史記》」這一部分。

倪豪士教授對《史記》及中國文學的研究主要對文本採用細讀精研的方法及新批評觀點與形式主義批評的結合，這也正是西文漢學研究者與國內有些學者宏觀研究、綜合分析的不同之處。無論詩歌也好，小說也好，他們都是一篇篇讀過去，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凡是不合理之處都要問個為什麼？這裏試舉倪教授對《張丞相

- 9 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A Re-examin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 Reasonable Official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再論《史記·循吏列傳》），*Early China*, 16 (1991): 209-33；“The Implied Reader and Translation: The *Shih chi* as Example”（編輯讀者與翻譯：以《史記》為個案），*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ugene Eoyang & Lin Yao-fu, ed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5), pp. 15-40；“*Shih chi* te ‘Shang-hsia wen pu lien-kuan chü-tzu’”（《史記》的「上下文不連貫句子」和司馬遷的編撰方法），Wang Chu-ching（王初慶），ed., *Chi-shih yü lang-man—Shih chi kuo-chi yen-t’ao hui lun-wen*（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Taipei: Hung-yeh Wen-hua 洪葉文化，2002），pp. 353-61；“On ‘The Basic Annals of Gao Zu’: Liu Bang and Biography in Sima Qian’s Eyes”（高祖本紀研究），*China, in seinen biographischen Dimensionen*. Christina Neder et al., ed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3), pp. 47-55；“A Note on Ren An: The Residence, the Hunt and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Shiji*”（仁安研究），*Han-Zeit,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umpfeldt aus Anlass seines 65. Geburtstages*. Michael Friedrich, ed.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pp. 275-82；“*Shiji* ‘Jin shijia’ sange wenti chutan”（《史記·晉世家》三個問題初探），Proceed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2150th Anniv. of Sima Qian’s Birth, Xibe Daxue, 2008；“For Want of a Hand: A Note on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the Jin’ and Sima Qian’s ‘Chunqiu’”（晉世家與司馬遷的歷史觀），*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7.3 (2007): 1-20。
- 10 倪教授研究《史記》非常注意參照《漢書》，並進行比較，亦曾撰有：“*Shiji* yu *Hanshu* bijiao yanjiu de zhuangkuang”（《史記》與《漢書》比較研究的狀況），*Sima Qian yu Shiji lunji*（司馬遷與史記論集）v. 6 (Xi’an: Shaanxi Jenmin, 2004): pp. 162-165。
- 11 倪教授對中西方學學術界成果的介紹功不可沒，曾在《印地安那中國古典文學指南》中專門予以介紹，另有專門的學術論文多篇，如：“The Study of the *Shih chi*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國大陸的《史記》研究），*Das andere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5), pp. 381-403；“*Shih chi* tsai Hsi-yang”（史記在西洋），*T’ien-jen Ku-chin*（天人古今）(Sian), 1995.5: 7-8；“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Studies in the West”（百年西方《史記》研究），*ACQ*, 24.1 (Spring 1996): 1-51；“Tsai Mei-kuo k’an chin chi-nien de *Shih chi* yen-chiu”（在美國看近幾年的史記研究），Wang Chu-ching, ed., *Chi-shih yü lang-man—Shih chi kuo-chi yen-t’ao hui lun-wen*, pp. 1-22。
- 12 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A Review of Recent *Shih chi* Translations”（近來《史記》翻譯），*ACQ*, XIX.4 (Winter 1991):《亞洲文化》1991年冬季號，pp. 35-9；“One-Hundred Years of Translations of the *Shih chi*.”（百年《史記》翻譯），*Liang Han wen-hsiieh hsüeh-shu t’ao-lun wen-chi*（兩漢文學學術討論文集）(Taipei: Hua-wen, 1995)，pp. 1-55；“A Note on Édouard Chavannes’ Unpublished Translations of the *Shih chi*”（愛德華·查理斯未出版的《史記》翻譯），*Zurück zur Freude. Studien zu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und Lebenswelt und ihrer Rezeption in Ost und West.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Kubin*, Ed. by Marc Hermann and Christian Schwerman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Jari Grosse-Ruyke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52.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7), pp. 755-765。
- 13 *CLEAR*, 17 (1995): 207-17.
- 14 Victor Mair, e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11-26.

列傳)的研究為例。<sup>15</sup>

《史記·張丞相列傳》的結構問題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明明是多個人的合傳，為什麼司馬遷在標題上僅僅選用了「張丞相」一人來命名？而《漢書》中同一篇改標題為〈張周趙任申屠傳〉？<sup>16</sup> 倪豪士教授對於《史記·張丞相列傳》結構上的獨特性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它既非單獨的個人傳記 (individual biography)，亦非類傳 (categorized biography)，而由十三個相對短小的傳記組成，這十三個傳記以首個「太史公曰」為界又可分為兩部分。

倪教授敏銳地發現，張蒼、周昌、周苛、<sup>17</sup> 趙堯、任敖、申屠嘉六人皆擔任過御史大夫一職，所以好像〈張丞相列傳〉是一個漢初御史大夫類傳，但他又發現，六個人的敘述並非按照擔任御史大夫職務的先後順序進行，張蒼實際上是六人中最後一個做御史大夫的，所以簡單認為〈張丞相列傳〉是類似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倪教授認為，張蒼的傳記並沒有按順時間敘述，在張蒼「遷為御史大夫」之後，插入周昌、周苛、趙堯、任敖四人的傳記。任敖的繼任者曹窋被免之後，再以「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彌縫，將這上下兩段看似沒有關聯的傳記相連。倪教授還提出〈張丞相列傳〉存在多方面的編輯問題 (poor editing)，諸如文本錯置 (out of place)、段落之間缺乏過渡 (no transition)、軼事與傳記沒有整合 (little attempt to integrate anecdote into the main narrative)<sup>18</sup> 等等。論文中對此一細節問題的闡述，如張

蒼好書善律曆一事重複三次、對「方書」不同意思的理解、張蒼被王陵稱為「美士」時已 40 餘歲、每個人的傳記用多少篇幅的計算，都能見微知著，深入挖掘司馬遷的撰述特徵。

總體上，倪教授提出〈張丞相列傳〉在結構和內容上存在八個問題，分別是：第一，張蒼傳被切分為兩個部分；第二，強調張蒼妻妾以百數的私生活（這並非正史介紹重要官員時的慣例）；第三，有一些多餘情節，如張蒼喜愛行政文書、善於律曆、善於他的孫子爵位丟失的記載以及反復敘述其丟失相位；第四，傳中有兩個總結段落，破壞了敘述的流暢性；第五，在敘述御史大夫的傳記時忽視了曹窋；<sup>19</sup> 第六，張蒼被升為御史大夫時間上的前後不一致 (182 vs 180 B.C.)；第七，申屠嘉之後沒有提及漢景帝的第三位丞相周亞夫，而只說有陶青、劉舍為丞相；第八，種種跡象表明這篇傳記試圖記錄御史大夫的生活而非諸丞相列傳的集合。

關於第五個問題，曹窋為曹參之子，所以其傳記附在曹參之後。而倪教授認為，疏於編輯可能導致問題第三、第六和第七。剩餘的問題是關於〈張丞相列傳〉的取材與結構問題了。關於問題一、二，倪教授認為編者使用了多種材料（包括口頭軼聞）編撰《史記》，此卷後面的六個丞相傳記是在司馬遷死時未完成的部分，由後人或褚少孫添加上去的。<sup>20</sup> 關於問題四、八，倪教授在引證古人唐順之和鍾惺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後，<sup>21</sup> 仍然認為問題沒能根本解決。他大膽做出兩個推測。其一是

15 "Tales of the Chancellor(s): The Grand Scribe's Unfinished Business" 丞相列傳：《史記》未完成的篇章，*CLEAR* 25 (2003): 99-117; also selected to appear in *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Criticism* (Gale Group, 2005)。

16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只是《史記·張丞相列傳》的前半部分，後半部分車千秋、韋賢（韋玄成）、魏相、邴吉、匡衡諸人皆另有專傳。

17 按：周苛、周昌為從兄弟，周苛在劉邦為漢王時，亦曾為御史大夫（前 206-203），倪教授據此稱此部分為 6 個人的傳記（"Tales of the Chancellor(s): The Grand Scrib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03），但事實上周苛並未擔任漢朝的御史大夫（如其他 5 人一樣）。

18 諸如張蒼對王陵夫人的尊敬、張蒼父子及其子孫身高與官爵的對應等。

19 按：沒有關於其人的細節交代，僅一筆帶過：「(任敖守豐) 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後崩，(不) 與大臣共誅呂祿等。」

20 《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倪教授還運用統計學的知識，認為從押韻或字句的整齊角度而言，〈張丞相列傳〉中關於張蒼的四則軼聞可能來自於口頭資料，沒有經過潤飾修改而插入文中。

21 凌稚隆《史記評林》云：「以官卑人，張蒼傳酷吏傳同體，蒼傳御史大夫也，酷吏傳中尉廷尉也。」明代鍾惺云：「以『丞相』二字作眼，卻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傳只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灌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蒼引起，而諸人繼之後；或中入蒼，而諸人先後周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繼續藏露，其文至變，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司馬遷在臨終前沒有完成這篇傳記 (work in progress)；第二，這種結構問題在班固的《漢書》幾乎逐字的重複，說明這個有問題的章節在《史記》中原本就是存在的。

通過以上倪教授關於〈張丞相列傳〉這篇文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他研究的理路，追求嚴密的邏輯推理，根據敘事文學、史傳文學所應有的邏輯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囿於為古人的回護，實事求是，雖然沒有最終完全的解決問題，但探索性的精神還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倪豪士教授可以使用中文進行學術論文的寫作，〈史公與時勢——論《史記》對武帝時政的委曲批評〉是近年來較為優秀的一篇。<sup>22</sup> 該文重點考察司馬遷怎樣通過多樣化的撰寫技巧即委曲批評的方式，表明自己對於漢武帝時政的評價，指出司馬遷既反對武帝對匈奴的長年戰爭，也反對武帝任用酷吏。司馬遷採取的是一種委曲批評的方式，即所謂「繼《春秋》」之「忌諱之辭」。筆者曾有幸閱讀本文初稿，並給予了中文文句上的一些建議。當時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文章撰寫角度很新穎，後來《北京大學學報》主編、北大中文系程郁綴教授特別向時為北大中文系客座教授的倪豪士教授約稿，倪教授即擬撰此文，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sup>23</sup> 誠如在上文討論《張丞相列傳》時倪教授捕捉到漢武帝時期自申屠嘉之後的丞相，如許昌、薛澤、李蔡、莊青翟、趙周等五位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妮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sup>24</sup> 並沒有丞相位應有的功績，故而「莫錄其行起居狀略」，沒有專門的傳記。倪教授分析認為，司馬遷記述的是當時朝廷真正用事的人，比如張湯，通過《酷吏列傳》的描寫展示了司馬遷對武帝時政的看法。倪教授分析到：「如果太史公沒有為其他丞相列傳，他用什麼代替他們形容漢

武在位之年，表明自己對武帝進政的看法呢？看看《史記》目錄，竇嬰田蚡的《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以後有〈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代表應該做丞相的一位，〈李廣列傳·第四十九〉描寫武帝不能任用在對匈奴作戰中有功的將軍。〈匈奴列傳·第五十〉包括匈奴歷史和太史公自己對匈奴問題的看法。〈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從另外的視角來敘述兩位「以外戚重」的將軍跟匈奴戰爭。第五十二卷，《五津侯主父列傳》是給第三位漢武帝丞相公孫弘的傳記。但是，公孫弘自己承認「奉職不稱」。主父偃的傳記強調了當代匈奴政策的缺點。〈循吏列傳·第五十九〉因為沒有漢代循吏的例子，所以間接的可以算是強調漢武帝和「酷吏」的關係。考慮司馬遷在這些列傳描寫大臣名將的不少短處以後，可以更容易地瞭解他為什麼決定作〈遊俠列傳·第六十四〉。太史公認為在貪官酷吏橫行官場的時代，遊俠們如一陣春風悅人耳目……太史公通過遊俠與當時的貪官酷吏對比，深切感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由此說明雖然〈武帝本紀〉沒有流傳下來，太史公還是很明顯地批評他同時代的官人和政策。

倪豪士教授曾開玩笑地談起，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學比學古典文學更難，就像對學英語文學的中國學生來說，研究莎士比亞或濟慈甚至海明威可以使他或她與一個美國學者更接近於同一起跑線。他一生致力於研究與翻譯中國古典文學，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走出了一條以翻譯促進研究，以研究提高翻譯的學術研究道路。「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只有切實地走過，才能體味其中甘苦。以上只是對倪豪士教授領銜的《史記》英譯及他多年的《史記》研究做了挂一漏萬式的評述，殷切希望倪教授的翻譯與研究取得更大的進展，相信隨著其研究成果的不斷被認知（將其譯為中文是很好的方式之一），必將有力地推動《史記》研究的發展。

22 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7. 4: 111-119。

23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10，頁 2919。

24 《史記·張丞相列傳》，卷 96，頁 2685。